

论全面抗战时期贵州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

王 昊 仲¹ 龙 凌 云²

(1.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9; 2. 湘潭大学 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全面抗战时期,为应对日方严密经济封锁,保障后方军需民用,其时贵州省政府先后通过减免税收、提供贷款、奖劝手工、经营手工工场、设立改良推广机构等多种措施,大力扶持本省手工业发展。这些政府行为不仅使贵州降低了对旧有毒品产业的依赖,还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重要物资贡献,并直接、间接地推动了省内部分手工业的“半工业化”。然而,由于国民政府的主观上缺乏扶助贵州手工业彻底完成“嫁接改造工业化”的决心,加之部分扶助政策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难以落实,或正面效果被其他政策所削弱,导致政府对手工业的扶助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纵观战时贵州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其大致呈现出军事性、地方性、渐进性三个特征。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贵州;手工业经济;政府行为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4)05-0072-11

DOI:10.19742/j.cnki.50-1164/C.240508

中国近代手工业为众多学者所关注与研究。目前,学界在“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与传统手工业的变迁”“近代手工业的性质与地位”等诸多细分方向上已经产出了一批优质成果^{[1]26-33}。但是,由于学界在近代手工业史研究中仍旧存在一定的“畸轻畸重”现象^[2],这导致“近代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研究,相较手工业史的其他研究领域,依然较为薄弱,而这种薄弱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从宏观角度看,学界对“手工业经济中政府行为”的专题研究还停留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3],对于“战时经济很大程度上就是手工业经济”的全面抗战时期,学界却并未开展“政府行为”的专题研究。诚然,某些战时的行业统制研究、工合运动研究及手工业专题研究,已经对“手工业经济中政府行为”的议题进行了初步考察,但此种考察仍属“兼论”性质。

其次,从微观角度看,对战时国统区典型省份“手工业经济中政府行为”的研究较为罕有,而贵州又是战时后方重要的战略腹地与交通枢纽,是国民政府少数未受日军大规模侵扰,能够进行有效治理的省份,故对该省“手工业经济中政府行为”进行探究,显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目前,学界对贵州战时手工业的探究还略显不足,至于手工业经济中政府行为的专题研究更是迄今鲜见^[4]。实际上,战时贵州手

收稿日期:2024-05-11

作者简介:王昊仲,男,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近代手工业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中国近代学校手工教育流变研究(1867—1949)”(23BZS120),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优秀研究生教育创新资助项目“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官营手工工厂研究”。

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有何基本特征?在贵州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学界旧有论点“南京国民政府手工业改造进程被抗日战争所打断”是否完全准确?国民政府是否真正有意愿引导国内传统手工业走上“嫁接改造工业化”道路^[5]?这些都是本文通过对贵州战时手工业经济中政府行为的考察,试图初步讨论和回答的问题,权作抛砖引玉之用。

一、政策引导:手工业减税、贷款与奖励

日军全面侵华后,因战事不利,国民政府被迫内迁至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西南地区,为保证后方军需民用,战时手工业的经济地位凸显。其时,随着日军对华经济封锁加强,外输物资愈发困难。作为回应,国民政府于1938年确立了“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的战时经济建设方针^{[6]251-252},希冀以“手工辅助机器”^[7],支持对日持久作战。因此,战时贵州省政府对境内手工业的扶持力度日渐加强。

(一) 税收减免

全面抗战期间,贵州省政府陆续对部分手工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1938年,国民政府便通令各省需在1939年3月前,对绸缎、漆器、刺绣、桐油等在海外已有销路的手工产品,实行出口税免征或降低税率政策,并给予这些出口大宗商品在保险、运输等方面优待^{[8]13}。自1939年4月起,国民政府更是要求“后方各省制造之手工艺品及农业产品、农副产品”,皆应减征,甚至免征出口税^{[8]22},以“奖励外销,易取外汇,藉裕民生”。同时,考虑到那些由手工工场及乡村家庭手工业者出产的“量小价贱之平民日用必需品”,其销路大多局限于省内及邻省,甚至完全在县境“自产自销”,国民政府则规定可对生产方进行审核查明后,减免其成品与原料转口税^{[8]13}。这一时期,贵州作为国民政府能够有效控制的省份,往往是后者调整税收政策时先行商洽办理的省份,故贵州省政府不仅认真执行国民政府中央的出口税与转口税减免政策,还竭力克服地方财政困难,一面配合财政部整理省内各地捐税^{[8]45},一面服从国民政府命令,取消地方货物通过税等对物征收之捐税^{[8]32},从而让利于商民^{[9]54}。

政府的税收减免政策,使战时贵州部分手工行业迅速繁荣起来。以贵州大定的漆器业为例,全面抗战爆发前,大定漆器每年均需缴纳名目繁多的捐税,随着其时贵州省政府与重庆中央政府的共同扶持,至1942年,该行业已仅需缴纳称捐与海关税两种^{[10]314},加之当时市场需求增长,大定漆器业逐渐“发展异前”,畅销之广,“几遍战时西南”。仅在1943—1945年间,大定漆器的年输出量就由10万盒增至15万盒,输出价值则从2008万元猛增至7560万元,可谓兴盛一时^{[10]308},以至与漆器配套的制漆业,产量同样猛增数倍。实际上,其他诸如桐油、猪鬃、山蚕丝等拥有较广阔区域外市场的手工业,此时也因税收利好与市场需求的三重作用,产量“远超旧时”^{[11]89}。

(二) 贷款支持

全面抗战时期,贵州省政府与重庆中央政府也为贵州手工业提供贷款支持。一般而言,近代农村手工业主要包括家庭手工业、作坊与工场手工业、外出或流动的工匠手工业几种存在形态^{[12]281}。针对不同存在形态的手工业,国民政府则分别提供工业贷款、商业贷款与合作社贷款。

首先,工业贷款主要面向具备一定规模的手工工场。1939年,国民政府中央经济部正式颁布《小工业贷款暂行办法》^{[13]118},对后方拥有较好发展潜力的民营机器或手工工场提供贷款。这使地处贵州的西南制纸厂得以渡过“资金短拙”的难关^[14]。此外,作为战时贵州经济建设的“千手之佛”,省营贵州企业公司也积极出资,发挥自身引导作用。据贵州企业公司统计,至1943年时,公司合办、投资的企业便

有 23 所,投资总额达 2 790 万元,而其中就包含部分手工、半手工工场。与之相对的,公司全资办理企业不过 4 所,投资金额也仅 300 万元^{[15]167}。可见该公司基本贯彻了“(在事业开发中)私人不能举办者,公司出而倡导之;财力有不足者,公司加以协助”的设立初衷^{[16]63}。

其次,商业贷款主要面向小本经营的作坊手工业。1938 年,贵州省政府正式设立“小本借贷处”,专门办理本省手工业贷款。考虑到手工作坊普遍规模狭小、组织落后,故该处借贷条件较为宽松。如贵阳小本借贷处的《贷款简则》便规定:凡年满 25 岁以上,品德端正、身体强壮、不吸食鸦片、在省会居住一年以上者,素营或新营小本农工商各业者及行商,在拥有殷实铺保人的情况下,不分籍贯、不分男女,均可申请借款^{[17]157-158}。《简则》公布后,仅在 1938 年 10 月至 12 月间,便有 227 户申请借贷,合格准予贷款 165 户,审核通过率高达 72.7%,放款总额 20 374 元^{[18]123}。不仅如此,国民政府 1939 年通过的《提倡并奖助手工业生产以裕战时国民生计案》,也设置有若干经费,“专为贷助家庭或作坊手工业兴业之所需”^{[19]81-82}。贵州部分手工从业者因此得以顺利扩大生产。

合作社贷款主要面向农村个体手工业者。诚然,合作制下的联合经营是南京政府长期倡导的乡村手工业生产经营制度,其相较传统包买主制下的依附经营、业主制下的自主经营,能够高效整合经营者有限的生产资金与材料,提高小手工业者抵御风险的能力,但贵州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才真正在本省手工业中规模化引入这一生产经营制度。据贵州省政府统计,1941 年以前,贵州仍有 90% 以上的合作社属于信用合作社,然至 1945 年,全省已有近 20% 的合作社转变为生产合作社^{[20]155}。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都匀的制纸合作社、独山的织布合作社、施秉的纺纱合作社等^{[17]267-268}。至于合作社放贷的资金则主要来自战时各县新设的合作金库。1938—1942 年间,贵州合作金库数量便由 16 座增至 54 座,股本也逐年增加,为各地小手工业者提供资金支持^{[20]157}。如 1939 年时,贵州独山县合作金库就向这一群体提供贷款 5.49 万元,占到贷款总额的 25%^{[21]435}。此外,根据四联总处 1941 年统计,贵州各地农户在获得贷款后,也会将 30% 以上的资金用于手工业等副业的经营中^{[22]273}。

(三) 奖劝农工

全面抗战时期,贵州省政府主要通过颁布法令与举行展览两种形式,对手工业进行奖励。贵州省政府该阶段的手工业奖励法令,基本遵循国民政府经济部重新修订的《小工业及手工艺奖励规则》。《规则》规定:“对手工业品中有特别改良者”“应用外国成法制造物品确属精巧者”,以及“擅长特别技能制品优良者”,应视情况给予奖金、奖章、褒状与匾额 4 种奖励^[23],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贵州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

同时,贵州省政府亦十分重视利用商品展览会“奖劝农工”。全面抗战时期,原任职于国民政府中央实业部的吴鼎昌、周诒春,分别调任贵州省政府主席与财政部部长。二者作为“技术官僚”的代表,曾有力推动了战前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的举办及国货运动的开展^[24]。正因如此,二人主持黔政后,随即决定在 1938 年举办贵州省手工艺品展览会,以便政府对全省手工制品有一初步掌握,进而“续行奖劝”战时手工业。至于社会层面,贵州省手工艺品展览会除了能为手工业者构建一个“彼此观摩,互相藉镜”的平台,促使“优者愈求精进,劣者知所改良”外,还可令有志于扶助手工业的外省人士“得投资之信念”,本地人士“获维护之机缘”^[25]。

为奖劝手工业者,贵州手工艺品展览会专门设有“审查股”,负责对优秀展品审查颁奖。由展会《征集出品分类表》可知,全省手工艺品被划分为织染、日用、饮食、化学、音乐、教育、美术与工业原料八大类,每大类下再分细目,共有八大类五十四小类^[26],每种展品均详注产地、出品人、名称、价值等^{[27]K6-K25},备受参观者好评。上海《文汇报》记者在观展后就认为:“(展会)不乏手工良品,如能再加改

进,舶来的机器品,怕也要逊色了。”^[28]诸多优良展品也因此获得政府褒奖,从而声名鹊起。如贵定所产丝烟便在参会后获奖,并继续发展,一度酝酿出贵州第三大机器卷烟工厂——欧亚烟厂^{[29]19}。同样获奖的怀仁县成义茅台,更是至今仍负盛名^{[30]27}。此后,无论是1939年举行的贵州省物产展览会,还是1941年成立的贵州物产陈列馆,其目的皆旨在使省内人士“明了本省物产之真实内容,认识本省物产之经济价值”,借以获取改良意见与增产方法,最终“制造与推销日趋改进,生产与消费关系密接”^{[31]312},而将所有物产汇集陈列,并择优颁奖,又始终是省政府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激励手段。

二、扶助生产:设立农业、手工业改良推广机构

(一)手工业原料增产与推广工作

全面抗战时期,贵州省政府对部分经济作物进行了重点培育与推广,以此保障省内支柱型手工业获得充足的原料供应。一般而言,农业对手工业具有“正向连进”的作用,原料的增产会促进本地手工业的发展。贵州省政府在结合本省自然环境、市场需求、行业基础等多重因素后,决定大力扶持棉花、柞蚕与美种烤烟三种农产品的生产,并成立贵州省农业改进所,专门开展农业技术改良与推广工作,以此保障省内手工棉织业、丝织业及卷烟业的原料供应。

农改所成立伊始,便将棉花增产作为中心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前,鸦片是贵州最主要的农产品,而全省棉花产量却严重不足,以致境内大量手工纺织者只能通过鸦片向外商易取棉纱。因此,农改所在完成全省植棉测试后,于1939年设置施秉县棉花繁殖试验场,选育优质棉种。除培植棉种外,农改所还组织成立“贵州省临时棉作推广联合会”,根据各县环境差异,推广适宜棉种,指导当地的棉花栽培^{[17]505}。1939—1944年间,农改所先后在省东北、东南、南部等39个宜棉县推广施秉美棉、印江美棉、罗甸美棉等优质棉种,共计增加棉花种植面积140 186亩^{[32]116},较战前增长50%^{[33]75},有力支持了贵州手工棉纺织业的发展。

同时,农改所也积极对贵州柞蚕进行改良与推广。柞蚕丝作为贵州特产,曾一度为农户“最有利润之副业”^{[10]470},然而,因蚕农陈袭旧法、不知改良,战前柞蚕丝业已日渐衰微。有鉴于此,农改所于1938年成立柞蚕室,并在遵义创设试验场。1939年,育蚕试验场收种茧达46.2万粒,以进行柞蚕养殖技术改良,每蛾平均收茧数自此不断提高,两年后更是达到“历年成绩之冠”。另外,农改所还于遵义、桐梓等7县自设烘房,派员主持烘种技术改良,而为了推广这些新技术,农改所又分别派指导员前往各县,对蚕农进行烘种、饲育与病害防治方面的指导。针对乡村蚕农“收成丰歉全恃神佛护佑”的迷信思想,指导员甚至专门挑选部分蚕农,免费发给改良蚕种,由于示范户较普通蚕户增产甚多,故蚕农“无不兴奋”,“一时领种蚕户风起云涌”。经过农改所等多方努力,贵州桐梓、正安、湄潭等多个县顺利引入新式柞蚕培育技术,全省柞蚕丝产量也迅速增长^{[32]578-579}。1937年时,贵州全省蚕丝产量仅为21 925斤,而至1942年已达137 600斤,增产5倍有余^{[11]89},贵州手工丝织业因此得以重振。

另外,农改所还于省内引种、推广美种烤烟。全面抗战初期,农改所在贵州成功引种“佛光”与“特字400号”美烟,其平均亩产相较土烟增产10%~20%^{[32]46}。其后,农改所同样通过提供贷款、烟种及技术指导等方式推广美烟,使得贵州美种烤烟产量迅速增加。1940年时,贵州美烟产量仅有6 500余斤,然至1945年底,全省美烟总产量已高达287万斤,种植面积也超过40万亩^{[34]95},遍及境内27县^{[32]773}。在此背景下,战时贵州的手工卷烟业迅速发展起来。1941—1944年间,贵州手工卷烟业不仅纷纷以美烟代替土烟进行生产,手工厂社数也由17家增至45家^{[10]698}。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战时部分手工卷烟厂

坊采用小机器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逐渐高于纯手工生产,且又恰好拥有获取机器设备的渠道,这导致某些手工卷烟厂开始将传统手工工具与现代机器相结合进行生产,出现了“蒸汽机+石磨”的新型技术模式,而典型案例便是贵定县的手工卷烟业^[35]。

(二)手工业技术改良与推广工作

设立一批专门机构开展手工业的技术改良与推广工作,也是战时贵州手工业经济中极为重要的政府行为。实际上,国民政府1930年便于南京成立中央工业试验所,力图成为“工厂工业的顾问工程师,手工业的指导者”^{[36]119}。但由于战前国民政府一方面仍以机器工业为工作重心,另一方面也未对贵州手工业给予特别关注,这导致贵州的手工业改良推广机构,基本皆成立于全面抗战时期,其主要机构如下:

其一,成立手工业改进委员会。1935年后,随着“厉行禁烟”政策逐渐得到贯彻,贵州省政府将“发展固有之手工业”,作为全省“另辟利源”的关键之一。此种背景下,省政府于1937年颁布《贵州省建设厅手工业改进委员会组织章程》^{[37]799},并在1938年初正式成立贵州手工业改进委员会。该委员会直隶于贵州省建设厅,内设有干事委员、普通委员若干名,均为建设厅审核、任命之专业技师,以“统筹改进”全省手工业为宗旨^[38]。如手工业改进委员会为解决省内纸荒危机,便一方面通令各县公文用纸尽量采购本地土纸,且部分县市应广种构树、斑竹,用作造纸原料;另一方面又亲自设立流动示范造纸厂,并派员前往各县组织造纸合作社,藉此改良、制造高品质纸张^[39]。

其二,成立贵州物产研究室。物产研究室隶属于省营贵州企业公司,该研究室除进行“全省物产研究调查”外,亦负责“手工业之改良发展”。如研究室为切实“研究、改进各种物产及手工业”,于1942年呈请公司设立“实验工场”,其下设有漆器、竹器、食品、雕塑等多个加工部门。实验工场各部自成立后,不仅积极改进了漆器脱胎技术,还先后聘请湘、川两省技工入黔,辅助竹器改良工作,甚至专门派员奔赴云南宣威考察该地火腿制法^{[31]252-253},尽心于相关手工业的技术改良。

其三,组建“手工纺织推广委员会”。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手工纺织业与军需民用密切相关,故国民政府“尤注重手工纺纱问题”。为了更好“提倡手工纺织,推广新式纺织机和训练人民纺织技术”^[40],贵州省建设厅于1940年成立手工纺织推广委员会,并制定出一套自上而下的手工纺织推广计划。即由贵阳模范工厂大量仿制穆藕初等人改良而成的七七纺纱机,并运往产棉各县试用^[41]。同时培训一批七七纺纱机指导员与手工纺织技术推广员,分派各县开展技术推广,指导工作,待农民熟谙纺纱机用法后,便照成本价售给纺户、合作社^[42]。倘若纺户在经营中缺乏资金,也可委托委员会进行协助^{[43]16}。不仅如此,为克服推广工作“人手不足”的问题,手纺推广委员还编成《手工纺纱》宣传册,向乡村民众免费发放,以便农民自学手工纺纱技术^{[43]16}。在政府有效引导,以及战时手工纺织品市场日渐繁荣的双重作用下,贵州手工纺织业得到迅速发展。1937年,贵州年织布仅有129万匹^{[27]138},至1944年时,全省织布总数已达316万余匹,专业织户超过10000家,农村兼营者则有48621家,手工纺纱机、织布机分别达到157509架、76767架^{[44]329},全省棉纺织业产县、产户、产具、产量,均“比过去任何时代更大增”^{[45]25}。

三、必然选择:政府经营手工工场

(一)被动+主动:官营手工工场成立之原因

全面抗战期间,贵州省政府还开设有官营手工工场,该项政府行为的出现,实际上是政府对战争的应急措施。这一时期,日方的经济封锁与军事行动,不仅导致国民政府收入下降、国统区机械设备严重紧缺,就连满足机器工厂动力供应条件的县市也大量减少。同时,外货无法输进后的“需用尤繁”,又使

国民政府对某些行业的改良增产势若燃眉。此种局面下,官方不得不改变战前除贫民工厂等救济单位外,很少投资手工业的惯例,开始在官办厂企中广泛成立一批规模较小,逐渐嫁接现代先进技术的官营手工工场。

需要指出,战时手工业重要性的日渐提高,反过来也会促使国民政府更深刻意识到引导某些传统手工业“受外患之振奋自力更生,转入进步之列”的必要性^[46],而由政府设立、经营手工示范场,同样是达成该目标的重要手段。盖因官营手工工场不仅能被打造成旧式手工业改良后的样板间与技术推广站,对地方手工业者起到“以资倡导,而坚信仰”的作用,还能尽量收容失业难民与无业游民。因此,大量设立手工工场是国民政府在战时必然会做出的选择,只是这种选择既有被动的一面,亦有主动的一面。至于“工场手工业”为何会是政府经营手工业的主要形态,则与资本规模、产品销售、工具大小、制造方法等因素密切相关^{[12]291}。考虑到政府经营手工业会拥有相对良好的资金、技术、设备支持,且职工人数较多,故设立手工工场无疑是官营手工业最为合理的经营形态。

(二) 贵州典型官营手工工场经营概况

贵阳模范工厂、贵州丝织厂、贵州化学工业厂属于战时贵州较为典型的官营手工工场。首先,贵阳模范工厂是一座集手工器具制造、纺织技工培养、纺织品生产等多重职能于一身的官营纺织厂。1936年,贵州省建设厅正式创办该模范工厂,尽管工厂在1939年一度遭战火焚毁,但其很快于同年重建,并开始重点经营手工纺织。模范工厂内设有专门的金工部与木工部,可制造铁织机、木质弹花机等纺织器具,其品质“较之省外,殆有过之”。此外,模范工厂专门设有“手工纺织推广人员训练班”,教授棉产地青年先进纺织技术。训练班培训以4个月为一期,培训科目包括轧花、弹花、制靛、纺纱、织布、工厂管理及技术推广等内容^[47],学员学成后即“赴外县推广”。最后,模范工厂也兼营手工纺织品生产。自1939年重建后,该厂所制棉纺织品“量虽不巨”,可“质尚不恶”,很受社会欢迎^[41]。这一时期,工厂内有自制铁机12部,木机10部,均以手工织造,月产各色布料400匹左右^{[45]34}。直到1944年,工厂才因“黔南事变”损失过重,而宣告停业^{[48]1403}。

其次,贵州省政府在1939年成立官商合营性质的贵州丝织厂。该厂由省营贵州企业公司与遵义、湄潭等县地方人士合办,官方占股80%,具有绝对主导权^{[48]1092}。丝织厂下辖柞蚕制种场与织绸厂,是兼具丝茧收购、生丝缫制、织造染炼、丝绸销售等多重职能的“丝业综合体”。建厂初始,丝织厂“全用手工木机”制造西服绸、直贡丝等产品,自1941年起才陆续添购数台铁机设备,尝试以简单机械逐渐取代手工工具^{[48]1089}。1943年时,丝织厂又开始兼营棉织。此后,直到1945年对日作战结束,丝织厂始终处于盈利状态^{[10]624}。

最后,为解决战时贵州省内肥皂、蜡烛等日用品“价高量少”的问题,省政府于1940年独资创设了贵州化学工业厂。贵州化学工业厂“制品全赖手工”^{[48]1154},同样是比较典型的官营手工工场。这一时期,贵州化学工业厂以贵州特产之木油为基础原料,在主制肥皂、蜡烛的同时,兼制文具与化妆品“配合供应”,其年产肥皂最高可达15000箱,蜡烛10000包^{[10]558},为供应战时贵州民众日常生活所需作出重要贡献。然而,由于该工厂在战时“交通不便,原料不易集中”,且生产“纯系手工”,故其产量虽逐年增加,但仍供不应求^{[48]1154}。1944年后,该厂亦受“黔南事变”影响而日渐衰落^{[10]559-561}。

四、战时贵州手工业经济中政府行为的成效与不足

全面抗战时期,贵州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无疑促进了省内手工业的繁荣,但省政府在扶助手工

业的过程中,同样存在某些不足,最终导致其对手工业的扶助并未完全达到预期。

(一) 政府行为的成效

战时贵州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一定程度上使省内官民降低了对旧有毒品产业的依赖。全面抗战爆发前,贵州诸多手工业的发展极度仰赖毒品贸易,“贩洋纱入黔以易鸦片”便是典型。毒品经济从短期来看,确实能给当权者带来暴利,然而从长远观之,却会使贵州陷入产业结构单一、工业化水平低下、民众健康受损的危局。是故,南京国民政府在1935年真正掌控贵州后,便开展禁烟运动。随着全面抗战爆发,贵州更是迅速成为大后方的重要腹地与交通枢纽,省内手工业也因此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得益于其时政府的正向引导,贵州大量手工业旋即繁荣起来,进而一面代替外货“堵塞漏卮”,一面抵补“贵州禁烟以来所失之利”,可谓“一举数善”^[25]。

不仅如此,战时贵州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还有效缓解了省内,乃至西南大后方的物资短缺问题,为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其时,贵州省内大多数行业的经营形态仍属于手工业范畴,且手工业产量也占到战时工业总产量的一半以上^{[49]271},这些手工产品极大支持了战时军需民用。如1938—1942年间,在省政府的贷款支持下,仅省会贵阳资本超过5000元的棉纺织工厂就由16家增至28家^{[50]165},加之政府同时在乡村地区大力扶助手工纺织,最终有效缓解了战时“纱荒”问题。这一时期,除去青年军和部分远征军外,其他军队的被服基本“完全由中小织布厂(坊)供应”^[51]。此外,贵州的手工卷烟业在战时同样取得长足发展。1941年时,贵州只有十几家手工卷烟厂坊,然而到1945年已增至120家^{[45]133},其所产卷烟亦成为国统区军民苦中作乐的消遣品。实际上,手工产品除满足国内需要外,就连政府换取海外援助,同样“多仰赖农村副业(产品)之供应”^{[52]359}。以至时人评价道:“大后方的小工业家与广大的农工劳动群众,对于国家民族的实际贡献,较之浴血火线上的战士,并无多大逊色。”^[53]

战时贵州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更是有力促动了省内部分手工业的“半工业化”。在工业化背景下,以市场为导向、技术进步、分工明确,则是“半工业化”的典型表征^{[12]443}。如贵州丝织厂在建厂伊始,皆依靠手工木机进行生产,随着政府资金的持续投入,不少工具逐渐改为铁机^{[48]1089}。此外,贵州玻璃厂在1940年成立之初,一度也“机器未备,暂用手工制造”^{[54]116}。但是,在省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该厂不仅陆续添置了压机、车床、钻床、口机等机器设备,厂内工人还逐渐被细分为“吹工、磨花、烧光、平片、仪器、模具”等多个工种^{[48]1149},属于极为典型的通过“嫁接改造”方式,实现自身“半工业化”的手工业工场,其已然具有机器工业之雏形。同时,这些兴起于战时的半工业化手工工场,往往还是政府开展手工业技术改良与推广工作的重要执行者之一,为近现代贵州的工业化打下一定基础。因此,旧有“南京国民政府虽开启了手工业的嫁接型工业化之路,却被不久后爆发的抗日战争所中断”的论点,似乎有待商榷,至少部分地区的某些手工行业,其改造进程并未中断。这也与一些学者在考察战时后方机械工业后,“并不赞同中国工业化道路被战争所阻断”的观点相呼应^{[55]366}。

(二) 政府行为的不足

其时贵州省政府在扶植本省手工业的过程中,也存在某些弊病。实际上,贵州省政府并无扶助省内手工行业彻底完成“嫁接改造工业化”的决心^{[1]438}。正如前文所言,政府之所以扶持手工业,更多是对日方经济封锁的一种因应。是故,一旦战争结束,随着机器、洋货重新输入国内市场,以及贵州战略地位的下降,官方对贵州手工业的支持便立刻流于表面。如仅在1945—1949年间,贵阳市内手工纺织户就从近600户锐减至100余户^{[10]599},稍具规模的民营手工工场也外迁16家,歇业60家,占到政府登记工厂总数的45%^{[10]481},而省政府此时几乎没有作出任何有效举措来保护战时艰难发展起来的民营手工业。不仅如此,省政府对官营手工工场也失去了继续经营的热情。1944年时,贵州官营玻璃厂尚有123名

职工,至1946年初却仅余70多人^{[48]1149}。贵州丝织厂尽管在1945年底仍能取得较多利润,但最终依旧难逃于1947年停业的命运^{[10]624}。一般来说,一个现代型政府行为将很大程度上决定落后国家工业化的成败,传统手工业的嫁接改造势必离不开政府的倡导与扶持^{[1]441},可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却显然对那些已经开启渐进工业化的手工工场“不屑再加培植”“不如任其倒闭”^{[10]481},国民政府的“非现代性”由此得以窥见。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战时部分手工业的政府行为也难以落实,如该阶段贵州省政府对某些手工行业的技术改良推广工作,便未能取得良好成效。以贵州竹器业为例,贵州物产研究室为改良该行业,曾一度聘请外省工匠协助改良,但推广工作却受制于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技术难度,长期陷于停滞,以至抗战结束时,贵州所产竹器“除少数甚为精美外”,余下仍然“式样粗俗,技巧欠佳,亟应提倡改进”^{[34]117}。时人何辑五言:“(贵州手工业)惟在战时因应社会之需要,专求生产量之增加,而于质的方面,未遑顾及,是以出品多较粗俗。”^{[34]112}这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政府战时开展的手工业技术改良与推广工作,依然存在涉及行业较少、推广区域有限的问题。

同时,某些手工业政府行为的正面效果,还会因其他政策的颁行而有所削弱。如贵州省政府尽管通令对战时部分手工行业的产品、原料,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但由于战争支出“日渐浩繁”,导致政府为减少财政亏空,只能转向乡村家庭手工业者征收更加高昂的田赋,以及向城市手工作坊主征收更多的营业税、所得税。以后两种税为例,在1937—1945年间,贵州省所收营业税便从24万元暴涨至2.54亿元,所得税亦从1.65万元猛增至7499.5万元^{[11]100}。此种局面下,政府对手工业的税收减免政策,其成效自然无法达到预期。

五、余 论

纵观战时贵州省政府对手工业的扶助行为,大致呈现出以下特性:其一,军事性。全面抗战时期,由于国民政府主导下的一切经济建设皆“以军事为中心”^{[6]251},故贵州的手工业生产自然也将“供给前方作战之物资为第一任务”^{[56]1}。如贵州省政府之所以力倡手工棉纺织业,便是棉布可“供给军事机关、部队备制军装之用”^[57]。至于那些产品无法直接服务于军事的手工业,政府则扶植它们用来换取外汇与军援^{[8]13},以及“在战时辅助机器工业”,补充后方生产,维持民众基本生活,进而服务于“持久战”的方针。其二,地方性。战时贵州省政府的手工业扶助措施,绝非对其时国民政府政策的机械执行,也较为重视本地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如贵州省政府选择重点保障境内柞蚕业、卷烟业等支柱型手工业的原料供应,且在发展官营手工业时始终将“这种手工业在贵州已有相当基础”作为选择标准之一^[58],便是该特性的直接体现。其三,渐进性。贵州省政府对手工业的扶植,从抗战初期延续战前已有的税收优惠、奖励良品等传统政策,逐渐深入到扶助本省手工业原料增产,改良并推广手工业技术之类的实际工作,最终更是设立官营手工工场,亲自经营某些关键行业,完成了从“保护者—奖励者—改进推广者—经营者”的递进式转变。

考察全面抗战时期贵州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对当今贵州省人民政府“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手工艺的保护和传承”^[59],亦有启发借鉴价值。首先,政府应重视利用现有渠道,对贵州的特色手工艺品开展推广宣传。如积极举办手工艺品展览会,设立非遗博物馆,为苗绣、布依地毯等贵州特色手工艺品提供稳定的展示平台,进而培养潜在消费者。再者,政府需开展实地考察与调研,选择市场反响良好的手工艺加以扶植。唯有政府一面深入了解贵州手工艺发展现状,一面掌握国内、国外市场需求,才能从贵州

丰富的传统手工艺资源库中选择出最适合市场化的产品,并对这些手工艺品采取合理的税收、贷款政策,以及针对性指导,实现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创新与品牌建立。最后,政府应积极承担起革新、推广新式手工技艺的角色。如聘请非遗传承人、技术专家担任特色手工艺传承导师,政府则可将工艺流程制成教学视频、学习手册,向民众发放,甚至还可于特色手工艺基础良好的乡村,通过集中开展线下培训、举办技艺比赛等方式激发乡民学习兴趣,最终形成一种政府引导,乡村民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性学习,培养更多技术过硬、善于经营的新型手工艺者。

[参 考 文 献]

- [1] 彭南生. 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修订版[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
- [2] 彭南生. 近50余年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述评[J]. 史学月刊,2005(11):106-115.
- [3] 参见彭南生. 晚清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06):48-55;彭南生. 评民初至抗战前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01):85-90.
- [4] 熊元彬. 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研究(1851—1938)[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5;熊元彬. 论云贵战时手工业的兴起及其畸形繁荣[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2):169-181.
- [5] 彭南生. 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 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14册[G].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 [7] 吴藻溪. 战时手工业的实际改进问题[J]. 时事类编,1938(28):25-27.
- [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 第2编 财政经济 1[G].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9] 江苏省“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编写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1辑 综合类 上册[G].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10] 李德芳,林建曾. 贵州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上):第2卷 工业、交通篇[G]. 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 [11] 谭启栋. 贵州省统计年鉴[M]. 贵阳:贵州省政府统计室,1947.
- [12] 彭南生. 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3] 唐润民. 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经济[G].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 [14] 小工业贷款[A].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经济部未刊档案,档号:18-06-036-02.
- [15] 贵州省档案馆. 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上)[G].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 [16] 贵州省临时参议会第五次大会记录[M]. 贵州省图书馆藏,1941.
- [17]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民国贵州文献大系:第5辑(下册)[G].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
- [18] 许先德,龙尚学. 民国贵阳经济[M].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3.
- [1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 第2编 财政经济 6[G].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20] 熊大宽. 贵州抗战时期经济史[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 [2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 抗战时期西南的金融[M].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2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四联总处会议录:第14册[G].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23] 小工业及手工艺奖励规则[J]. 经济部公报,1944,7(10):486.
- [24]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总会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征集展品案[A].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实业部未刊档案,档号:422/871.
- [25] 呈请先行设置贵州省手工业展览会筹备委员会[A]. 贵州省档案馆藏贵州省政府未刊档案,档号:M001-01-00292-0025.

- [26] 贵州省手工艺品展览会征集物品办法[A]. 贵州省档案馆藏贵州省政府未刊档案,档号:M001-01-02778-0027.
- [27] 张肖梅. 贵州经济[M]. 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9.
- [28] 长诚. 贵州新建设(续)[N]. 文汇报(上海版),1938-11-26(05).
- [29]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史志编纂委员会.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第25卷 烟草志[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 [30] 政协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贵州旅游文史系列丛书》编委会. 国酒之乡[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 [31] 贵阳市档案局. 抗战时期的贵阳工商业[G].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 [32] 蒋国义. 贵州省农业改进所[G].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 [33]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民国贵州文献大系:第3辑(下册)[G].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
- [34] 何辑五. 十年来贵州经济建设[M]. 南京:南京印书馆,1947.
- [35] 顾隆刚. 欧亚烟厂与贵州烟业的发展[J]. 贵州社会科学,1983(04):36-39.
- [36] 杨德才等. 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稿[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 [37] 贵州省单行法规汇编:第3辑(下)[M]. 贵州省图书馆藏,1938.
- [38] 省建设厅手工业改进委员会组织章程及指定委员名单令准备案[A]. 贵州省档案馆藏贵州省政府未刊档案,档号:M001-01-02224-000.
- [39] 贵州省建设厅呈送手工业改进委员会会议记录[A]. 贵州省档案馆藏贵州省政府未刊档案,档号:M001-01-02461-0001.
- [40] 为手工纺织推广委员会成立日期及请核示组织规程事复建设厅函[A]. 贵州省档案馆藏贵州省政府未刊档案,档号:M001-01-02225-0001.
- [41] 龙珊. 贵阳模范工厂[J]. 贵州档案史料,1998(02):14-25.
- [42] 签呈对省建设厅虞振镛拟具提倡手工业纺纱计划书的审核意见[A]. 贵州省档案馆藏贵州省政府未刊档案,档号:M001-01-00392-0005.
- [43] 贵州省手工纺织推广委员会. 手工纺纱[M]. 贵阳:贵州省手工纺织推广委员会,1940.
- [44] 李振纲,史继忠,范同寿. 贵州六百年经济史[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 [45] 林兴黔. 贵州工业发展史略(约公元前22世纪—1949年)[M]. 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 [46] 湖南建设厅浏阳造纸厂关于遵令拟具职厂事业计划30年(1941年)度业务报告与组织规程给湖南省建设厅的呈[A]. 湖南省档案馆藏湖南省造纸厂未刊档案,档号:M104-001-00025-00001.
- [47] 贵州省政府秘书处函达省建设厅该厅所送手工纺织推广人员训练班组织规程准予备案及修正招收纺织训练班学员办法草案[A]. 贵州省档案馆藏贵州省政府未刊档案,档号:M001-01-02458-0001.
- [48] 贵州省档案馆. 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下)[G].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 [49]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抗战时期的经济[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
- [50] 杨开宇,廖惟一. 贵州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
- [51] 徐崇林. 中小工业在抗战中的贡献[J]. 西南实业通讯,1946(3-4):1-2.
- [52] 彭泽益.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4卷[G].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 [53] 谭思文. 中国中小工业之前途[J]. 西南实业通讯,1946(3-4):10-11.
- [54] 金富军. 周诒春文集[M].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7.
- [55] 严鹏. 战争与工业:抗日战争时期装备制造业的演化[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 [5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 第2编 财政经济 5[G].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57] 汇款支付利息购运棉花[A]. 云南省档案馆藏云南省经济委员会纺织厂未刊档案,档号:1047-001-00188-026.
- [58] 王潜恒. 发展贵州手工业的管见[J]. 贵州企业季刊,1942(01):27-32.

[59] “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EB/OL]. (2021-6-9)[2024-7-3].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6/09/5616511/files/3953c9f8a68f4d6baa61adbaa4817827.pdf>.

On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in Guizhou's Handicraft Economy during the Comprehensive Anti Japanese War

Wang Haozhong¹ Long Lingyun²

(1.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bei Wuhan 430079;

2.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ical Culture, Biquan Academy, Xiangtan University, Hunan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tight economic blockade by the Japanese side and to protect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 needs of the rear, the Guizhou Provincial Government has vigorously supported the development of handicrafts in the province through multiple actions, such as tax reduction and exemption, the provision of loans, the awarding and persuasion of handicrafts, the operation of handicrafts workshop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improvement and promotion organizations. These government actions not only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Guizhou getting rid of the drug economy, but also made an important material contribution to the final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d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promoted the “semi-industrialization” of some handicrafts in the country. However, due to the subjective lack of determin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 help Guizhou handicrafts to complete the “grafting transformation industrialization”, coupled with the fact that some of the support policies were difficult to implement in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r the positive effects were weakened by other policies, the government's support for the handicrafts did not fully meet the expectations. Throughout the government's behavior in Guizhou's handicraft economy during the war, the government's behavior was characterized by three features: military, local, and gradual.

Keywords: comprehensive war of resistance; Guizhou; handicraft economy; governmental behavior

[责任编辑:刘力]